

导言： 研究中国共产党与文化关系的四个角度^①

出于研究创新的思考，也受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启发，将中国共产党及党的历史与中国文化联系起来加以研究，逐渐成为学者感兴趣的一个课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

其一，以往这个方面研究不足，现在研究有开拓性意义；

其二，把文化研究的视野、概念，以至方法引入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可以开阔研究者的眼界；

其三，将中国共产党包括党的历史与文化联系起来考察，有利于帮助人们从一个新的侧面了解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奋斗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也有利于对党的理论、建设及历史有更深一步的认识。

由于这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目前还没见到有文章探讨有关研究的理论方法问题，一些对此课题有兴趣的人们特别是青年朋友对于如何研究尚有些迷茫。当然，研究者多有自己的理解，按自己的理解先干起来，理论和方法自然会产生在研究当中。但若先就研究对象、范围等作些一般性讨论，或许会有助于研究的

^① 2001年12月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举办哲学社会科学前沿论坛，这是我应北京中共党史学会之邀在论坛上所作报告的讲演稿。收入本书时作了些修改、补充。

开展或吸引更多的人关心以至加入研究。1996年我申请到北京市“跨世纪百人工程”资助的一个项目，叫做“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开始思考有关文化研究方面的问题。后来将博士生招生方向定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化”，报考者纷纷询问研究什么问题和怎么研究。这使我感到有必要谈谈对此问题的想法。

我想提的问题是从什么角度来研究中国共产党与文化的关系？

目前见到的说法有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或政策及其实践等说法。这反映了学者对此问题不同的思考。

我认为，研究中国共产党与文化可以有四个角度：

- (1)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传统文化；
- (2) 中国共产党与20世纪中国文化；
- (3)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思想理论政策及其实践；
- (4) 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

首先谈谈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

关于文化和传统文化，在研究文化和文化史的学者中有不同的理解。通常认为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文化，这应当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把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文化放到一起比较，的确可以看到诸多明显的不同点，因而可有中西文化之分；以其同当代文化比较，又有许多不同点，因而有古今之分。但谈到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就有了一些问题。

中国共产党创建于20世纪20年代，那个时候鸦片战争已过去80多年，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了近80多年外来文化的风雨，特别是经过戊戌到五四时期新的文化思潮和运动的冲击，已经发生若干变化。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诞生及其从事革命建设活动时

期的社会文化氛围，已经不全是鸦片战争前那种纯粹传统的，而是经过欧风美雨浸淫变化了的近代的了。进一步说，中国共产党建党至今也已有 80 多年的历史，在这 80 多年中也形成了自己的包括思想、理论、作风、价值观念、思想政治工作等内容的文化传统。因而，有人考虑中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时，把党本身的文化传统也作为其中一部分。这样一来，中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就复杂化了。

我之所以提出从几个角度研究这个问题，原因之一就是梳理一下这里面的复杂关系。

我以为，研究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主要是研究中共与中国古代文化之间的关系。理由有二：

第一，近代中国文化虽然有中西文化融合的一面，中国古代文化因素的存在与影响仍是十分明显的。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种情况形成两个事实：

一是中共早期领导者中大部分人受到过传统文化的熏陶，在他们转变或成长为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通常经历了对传统文化扬弃的过程，其间以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批判传统文化的方面是主要的，但也或多或少保留了一些传统价值观念和思维行为方式。后者当中有的同马克思主义结合，成为进步的积极的成分，有的则影响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带来消极影响。

二是中共诞生和从事斗争的社会环境中的文化尽管是中西乃至更多种文化因素杂然并陈，中国文化表现出来的特征还是相当明显的。比如，就典籍文化言，从 1919 年到 1949 年间全国范围内，负载传统文化信息的图书出版数量或许不会低于负载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外来文化信息的出版物的。而在民间、在下层工农民众中间，由传统文艺形式如说书讲古地方戏之类表现传统文化内容和长辈对晚辈口耳相传的道德说教中的传统成分以及流行的传统礼俗之类对人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更为明显。这些文化因素

与中国共产党人的联系或说对中共党人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它相当程度地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和思想建设的方式、内容及特点。从这个角度所作的研究可以使更清楚地认识中国共产党及其成员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理解传统文化对中共领导革命和建设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及意义。

此外，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大体说，中共创建最初的十几年里，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将传统文化作为封建主义文化加以批判。抗日战争爆发后，特别是以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论为标志，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成为中共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和基本政策。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和政府进一步提出将弘扬传统文化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这个角度，可以研究中国共产党对于传统文化所持态度和方针政策转变的历史过程、社会原因，以及得失经验。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中仍有实用价值，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认同这一观点，这也是新一代中共领导集体主张弘扬传统文化的理由。从这一点出发，研究传统文化中的哪些内容在当今时代仍有其价值？哪些内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发生过积极作用，可以使之继续发扬光大？从理性的分析和历史经验的总结两个方面确定将传统文化中的若干积极因素纳入当代中国文化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之中，或者采取一定方式，对传统文化中的部分内容实行某种“创造性的转换”，都是有意义的。

从上面的角度研究中国共产党与文化需的关系要一个前提，就是了解传统文化有哪些内容，亦即传统文化中的什么东西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

张岱年、方克立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解释文化内容是就所谓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风俗习惯）文化、心态

文化（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再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前者为大众心态，即大众的要求、愿望；情绪等，后者为统治阶级知识精英的思想，表现为国家政治法律原则、伦理道德规范等）“四层次说”谈起的。^① 概括说这些文化因素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形的东西，特别是著作文字中包含的文化信息，二是积淀在人们内心的意识或无意识。

从另一角度看，传统文化虽然以儒家为主体吸收佛道形成一套政治伦理观念及相关的思想行为准则和礼俗习惯，但其内容十分复杂，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有不同表现，又有所谓正统同非正统、精英与大众、精华和糟粕之别，即使儒家传统内部也有汉宋今古义理考据之分。所有这些都可能对共产党人发生影响，并且决定了影响范围、渠道、方式、状态的复杂性。

我们在研究时既可以考虑作为政治团体的党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也可以考虑作为部分群体（如可以分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中层领导人、一般党员、党内知识分子等）和个体成员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这里的关系又可以分为显意识和潜意识两种，前者表现为著述文字中针对如何看待或对待传统或其中某些内容表达的主张、意见，后者指思想或行为方式中流露出的带有传统色彩的特点。

其次谈谈中国共产党与 20 世纪中国的文化。

“20 世纪中国文化”是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混杂、相交融而发展变化的一种文化状态。从这个理解出发研究中共与文化的关系，着眼点可以再分为三：

一是研究中国共产党活动的历史文化氛围，即中共是在怎样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5 月版，第 5 页。

的文化环境中诞生、成长、发展、壮大和从事斗争的？这种文化环境对党有什么影响？

二是中国共产党所代表所宣传所推行的文化与同时代其它文化有哪些相联系或相似相同之处，与同时代其它文化比较有哪些不同之处或说有哪些属于自己的特征？

三是中国共产党在文化问题上的主张或理论是什么，她所主张所创造的文化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占有的地位，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

从事这方面研究，重要的前提是要对 20 世纪中国文化有整体上的把握，对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各种文化有较好的了解。现在一般讲 20 世纪中国有三大文化思潮：一是马克思主义，二是自由主义，三是保守主义。这样分是否合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应列入哪一种思潮？它与后来蒋介石陈立夫的文化主张有无区别和怎样区别？这类问题可以再考虑。但大体上这些派别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从历史上看，代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以革命的力量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化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里边值得考虑的问题一是中共的胜利和其他派别的失败是否也有文化上的原因？如果有，是什么？另一个问题是，抛开历史的或功利的考虑，从理性的价值的意义看，其他派别的文化主张是否也有可取之处。这些问题都有研究的必要。

再谈谈中共的文化思想理论政策及其实践。

这方面的研究内容似乎应当包括在中共与 20 世纪中国文化研究的内容之中的。所以将其单列出来，是考虑到上面的角度着重从整个时代社会的大背景去看中国共产党与文化的关系，而这个角度则着重看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的形成发展，党在不同时期领导革命和建设提出的文化政策及其实施，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领导的根据地解放区的文化建设成果及其成为执政党后全国范围

内文化事业的发展成果。从这个角度可以做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思想史或中共文化思想理论及其实践史，其中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引入、传播、理解、运用、发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旧文化进行的改造和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创造，以及中共领导下的教育、科技、学术、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以至体育、卫生等各种文化事业的发展等等。

从这个角度进行研究还可以有不同的视域，如既可以整体上研究党的文化理论与实践发展史或革命根据地、解放区和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发展史，也可以分别研究中共领导下的教育事业发展史、科技事业发展史、学术发展史……

最后谈谈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

这方面的研究内容似乎可以包括在上面第三个方面的研究之中。但第三个方面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从这个角度研究主要考虑现实和未来，好比党史研究和党建研究，虽然彼此包含，却又有明显的界限。

从这个思路应当侧重研究中国文化的现状、发展趋势、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文化内容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思想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实践，预测文化前景，规划健康的文化发展道路等。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应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将这类研究与探讨中国社会发展前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已经存在或即将遇到的若干问题、中国与世界各国间的交往及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文化的发展前景等结合起来，目的是理性地考虑中国文化发展道路，为党和国家政府有关文化方面的决策提供参考意见。这方面可做的工作有很多，如了解当前社会道德、教育、学术研究、新闻出版、宗教、公共环境和人的健康、互联网络等各社会文化领域到底存在什么问题，怎样解决等等，都是研究中国共产党与文化的关系所应涉及的内容。

读者后面看到的是作者就上述第二个角度所作的一些思考。

我理解，20世纪中国文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国门被迫打开之后，随着大一统专制政治秩序的逐渐瓦解和新的社会力量生长、新的文化观念输入，传统文化的统治地位发生根本动摇。文化伴随社会政治矛盾的解决，顺应社会发展而更新。因而，在几乎整整一个世纪里我们都在寻找、校正着中国文化发展亦即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一定意义上也是应这个要求而生，为实现这桩使命而奋斗。我的考虑是将中共党人为寻找中国政治和文化出路的奋斗放到整个社会的文化思潮背景中，通过对比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代表人物与中共党人的文化主张，反映整个民族对文化出路的思考和中共党人文化主张的特点；通过对毛泽东、邓小平和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文化观点的评析，反映中共党人文化思想的发展；通过分析中国共产党引进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按照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文化观改造中国人的观念推进社会文化事业发展，展示中国共产党给中国文化带来的变化和进步。

有关中国共产党与20世纪中国文化关系的研究包含范围很广，复杂而具有诸多触点，可探索、讨论、辨析的问题举不胜举。我的研究只能说是初步的。由于水平有限，错误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第一章 新文化与新知识分子

第一节 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1

1874年日本政府以琉球船民在台湾遭难为借口，出兵侵入台湾。10月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清廷代表与日本全权办理大臣参议兼内务卿大久保签订《北京专约》，中国赔偿受害人抚恤金白银10万两，补偿日本退兵修道、建房用费40万两。^①清政府初次感到来自东方蕞尔小国日本的威胁，由此引发了著名的海防塞防之争。

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武英、文华两殿大学士而为“中外系望”，政府“亦依以为重”的李鸿章力主海防说，并借机呼吁开风气破旧习，重视洋务。他的理由是：

“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阳托和好，阴怀吞噬，一国生事，诸国构煽，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瞬息千里，军火机器工利百倍，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而环顾当世，饷力人才，实有未逮，虽欲振兴而未由。易曰：穷则变，变则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43页。

通。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①

且不说李鸿章有关疆防问题所持主张正确与否，也不评论洋务运动在近代历史上地位如何，单就“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这番话来看，应当说李鸿章是有时代眼光的，以至于 100 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首那段历史时，不能不承认，用这句话来形容当时中国所处的境遇，是再直白简练贴切不过的。

尽管如此，我们还要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李鸿章权倾当朝的地位和身当外交第一要冲关键的职责使他有条件直接接触处理一宗宗外交事宜，思考外来船坚炮利的威胁给中国带来的危机。但他不过是比同时代别的人更为精明一点，仅此而已。诚如张之洞所说“无怪乎合肥之得志也！遍观中外（按指朝廷内外）大小臣工，学问非不好，品行非不好，即心术亦未必都不好，然问以大小炮数百种，后膛精枪亦数百种，形式若何，运用若何，某宜水，某宜陆，某利攻，某利守，某利山林，某利平地，其左右前后之炮界何在，昂度低度若何……以及水雷旱雷炮台地营一切攻守之具，无一人能知，且并其名亦不能辨。又况西人政事法度之完备，有十倍精于此者。某国当与，某国当拒，某国善良，某国凶狡，吾之联之而备之者，其道何在，宜更无一人知之矣。稍知之者，惟一合肥。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②

某种意义上作为李鸿章继承者的这位张香帅的评论不像是别有用心地挖苦。所以，那句“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话，是可以用到李鸿章身上的。针对我们的话题来说，近代中国面临的大变局，远不止于海禁大开，列强构煽。它实际上是意味着中国传统社会在与西方文明的不可避免的冲突中发生了极其严重的危机。

① 《李鸿章传》，《清史稿》卷 411。

② 引自谭嗣同：《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1 年版 第 158 页。

2

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有两个基本特征，使中国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影响：一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及其内在要求是向外扩张，不把全世界变为市场不会罢休；同时它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这就决定了近代中国注定要成为资本主义东来扩张的重要目标，而当时的中国，尚没有力量阻敌于国门之外。二是西方文明在技术、制度、价值观念几个方面的优越性都超过当时的中国。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来说，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比封建主义社会进步。文明冲突的结果，通常是落后一方被先进一方同化，或者是落后一方因着先进文明的渗透而发生重大变革，使自身有足够力量与先进者抗衡或加入先进行列。

以上两者合在一起，构成中国近代社会发生巨变的驱动力。这股强大的动力势将推动中国在社会组织结构、经济生产方式、政治治理方式、价值观念等方方面面都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个变化远远超出传统中国的改朝换代式变化，所以是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今天我们称这个变化为社会近代化或现代化。这个变化的端倪李鸿章看到了，但它的前景和实质，李鸿章没有识透，也不可能识透。其实，不要说李鸿章，在近代中国众多关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仁人志士当中，极少有人明确地从“现代化”这个思路来理解近代中国的前进方向。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时，“现代化”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才为全社会认同。当然，没有明确提出“现代化”概念不等于没有现代化意识。近代史上不同时期进步人物、派别、团体、政党，循着各自选择的挽救危亡复兴民族的途径，提出自己系统的主张或方针政策并使之付诸实施，或多或少都带有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意义。

3

依照社会模式或社会形态转变的说法，现代化是一个系统的转化工程。它通常从经济的变化开始，由生产力高度发展，引起生产关系变化，带动社会政治法律制度和文化教育等意识形态各领域发生变化。但在历史上，不同国家的社会转型道路往往有别。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肇始于外力的撞击。尽管近年来，受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观点启发，较多学者已在费正清的“冲击——回应”解释模式上前进了一步，更多地探讨中国社会本身自明清以来的新动态，以期寻觅出促进转型的内在因素，但是，无法否认，由于传统中国社会大一统专制制度的完善性和顽固性，内部的因素诸如资本主义萌芽、传统哲学中的变革观念之类，很难在原有圈子里开出一个不同于传统的新社会形态。在这里，内部因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来的冲击而以一种复杂方式成为现代化的部分动力的。

中国近代社会变化最先体现于传统统治权威的衰落。面临列强入侵，清政府对强敌缺乏足够了解，对世界大势盲然无知，措置乖方，抵御不利，屡战屡败，失去了保卫国家安全使之不受外来侵犯的职能。对于国内要求进步的改革运动，它却惟恐镇压不力，充分暴露出其自私、狭隘、保守、独断的本性。这使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出生于 1868 年的蔡元培，24 岁中进士、入翰林院、点庶吉士，两年后为编修，可谓年轻有为、前途无量。但就在戊戌政变后他断然辞职，携眷回乡。蔡元培此举不是因受维新派牵连。据高平叔记载，他虽然与梁启超有“同年”关系，“尤佩服谭复生”，但他既耻心依附“炙手可热”人物，对于康、梁的主张“亦不甚赞同”。他的弃官完全是由于对清政府

失望。^①史料提供给人們的这类例子虽然不多，却反映了政府威望在部分年轻下层官僚心目中失落的情形。

更为严峻的问题是政府权力的分散。道光年间的太平军起义虽然根由于清中叶即开始积蓄起来的矛盾，部分地也由于鸦片输入造成社会问题加剧了矛盾，并因外来文化渗入使之有了凝聚军心的精神工具。就如历史上多次重演的活剧一样，外患内忧接踵而来，对已有政治秩序的打击便是致命的。清政府侥幸平定了“内乱”，却付出沉重代价：对汉族官僚的延用导致主要以人际关系维系为特征的湘军、淮军兴起，以至拥兵自重的地方督抚地位上升。同治中兴的喜庆掩盖的是满洲贵族一统权力的铁板出现的裂痕。1900年5月25日慈禧太后以皇帝名义下达了一个借义和团力量对外宣战的诏书。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等竟斥其为“矫诏”而拒绝执行。经铁路督办盛宣怀策划，上海道台余联元和张之洞、刘坤一的代表直接与美国总统古纳会商，签订了《东南互保约款》。^②这件事固有“中外反动派勾结镇压义和团”的嫌疑。就中国政治而言，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地方官员对朝廷权威的藐视和挑战，表明朝廷统治权威在督抚大员心目中的地位衰落，地方政权对中央政府的离心力已可在一些特殊状况下公开暴露。这种情势与辛亥革命发生时武昌城中一声枪响竟在一个多月内导致内地18行省中的14个相继独立不无关系。

3

一个可以为学者公认的事实是：满清政府的垮台并非作为农业专制社会异己力量的资本主义强大压力的结果。近代中国资本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11页。

②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9页。

主义生产方式，由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内出现第一家民营企业算起，经过了长期缓慢发展，始终没有得到它在西方国家得到的那种在法律上和道义上君临一切的地位。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正是这一事实，决定了中国现代化不可能走西方之路。

中国资产阶级由于传统的影响和自身力量软弱，通常不敢像他们的西方老大哥那样明目张胆地悬起诸如立法保护私有财产、贸易自由之类的大旗。他们常常把自己的利益要求隐藏在进步官僚士大夫和爱国革命者争取国家民族利益的呼吁中。在清末的利权运动、保路运动中是如此；在五四爱国运动中也是如此。所以，清末民初的改良派和革命派与其说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不如说是整个民族要求摆脱侵略压迫寻求富强社会心理的代言人更为贴切。所以显而易见，近代中国的文化变革动力不在经济基础中新兴资本主义发展的声势和内在要求，而在于政治上救亡革命的要求和思想上睁开眼睛看世界所产生的对外部社会政治制度文化价值观念优越性、进步性的承认。

有人说，近代中国面临的危机是政治与文化双重性质的，很有道理。由人类历史观察，一个民族国家的生命能够延续，除了保障最基本的物质生产和生活资料外，总是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统治机构和一套文化价值系统。中国历史上虽有多次改朝换代，政治权力更迭，有时甚至是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但中华文化的价值系统得以代代相传，这是中华民族生命得以数千年绵延不绝的重要因素。传统文化不仅为统一民族提供了精神支柱，而且提供了一整套政治法律制度依据、伦理道德准则和观察事物为人处事的合理方法。但当近代人们发现西方入侵者强大的军事力量后面有着更具活力的政治制度和与之相应的文化价值体系时，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功能及其合理性便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对于人们突破传统价值观念的框框，接受新的价值原则是必要的和重要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有了一代敢于怀疑并放弃传统观念，接受新鲜思想的知识分子出现，才有了近代一系列有价值的改革思想，有了一系列进步的改革和革命运动。中国现代化由这些运动推动，蹒跚走过了 20 世纪的 100 年。这 100 年是中国文化最活跃的年代。

第二节 对传统文化的反思

1

李鸿章提出以“穷则变，变则通”来应对数千年未有的变局，其哲学依据仍是《易经》留下来的老法子。变的内容和原则则是魏源、冯桂芬提出，后来由张之洞集其大成的“中体西用”。尽管人们前后对这一概念的表述不尽一致，在不同时期，它所产生的历史作用和应得的评价亦不尽相同，这个主张基本上是在政治上完全保留传统皇权统治制度，在伦理原则上坚持传统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只是在技术层面引进西方先进的方法手段，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因此，它在现代化的意义上给人们提供的新东西并不很多。给人们带来具有实质意义变革观念的是领导戊戌维新运动的知识群体。

不过，作为变法运动领导者，同时也是变法纲领提出者的康有为，在摄取知识的青少年时代，所能得到的新思想还主要来自《海国图志》一类中国人编译的介绍国外一般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的史地风物图书和同文馆的外籍教习、江南制造局的外员与中国人合作翻译的基本上限于“声光电化”等“格致”内容的西学书籍。这些表面而不系统的材料，可以开思路，但以它们作为政治变革的理论依据来耸动视听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有力的变法理论还须从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找。

康有为继承常州学派，特别是自刘逢禄到龚自珍、魏源重新

阐发的今文经学，用官僚士大夫认同的考据方法，写出《新学伪经考》，在前人基础上试图进一步揭破以往二千年间“学人惑于群经”的真相，彻底掀翻古文经说；再写《孔子改制考》，试图证明中国上古历史“茫然无稽”，“周末诸子并起创教”都采用托古方法，孔子亦托古改制，所以做六经，以期阐明儒学的创新精神，改变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守旧观念，至少是为回驳守旧派官僚阻碍维新找到理由，给改革提供了一条义正词严的根据。

康有为是应变法需要把孔子“打扮”成改革家，还是确从孔子那里发现了改革思想而要承袭光大之，用其来指导现时社会的变革？这个问题或许不重要。从他提出的变法主张^①来看，他是要将封建皇权专制国家改造成为君主立宪国家。与洋务派的主张相比，这是带有质的意义的转变。不仅如此，他还将进化论及民主思想糅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如将“三世”观念与君主、立宪、民主相附会，将其对现代社会的生产组织方式的理解和自由平等观念体现于对“大同”世界的设想，等等。但是总体上看，他的思想依据仍旧是传统经说，这使他本人难以跳出传统的圈子。所以，变法失败后，他长时间持保皇立场——帮助张勋复辟一事表明他的保皇不仅仅是出于与光绪皇帝的私谊——并始终对传统儒家思想抱有深深敬意，以为孔子学说“不远人以为道，故不可离”，“内之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外之修身以至家国天下，及于鬼神山川草木，咸得其所”^②，既是圣言，也是教义，呼吁孔教入宪不遗余力。

相比之下，真正以新的思路考虑问题，带给社会全新观念的是比康有为年长 4 岁的严复。

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有三个要点，一是主张全变；二是要求形成上下一心举国一致的形势；三是建立领导变法的机构。参见拙作《百年中国政治思想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8 ~ 41 页。

^② 康有为：《重印〈新学伪经考〉后序》，北平文化学社 1931 年版，第 1 页

2

与康有为青年时期长期浸淫于传统典籍不同，严复 13 岁因做乡村医生的父亲去世，不得已考入费用低廉的福州船政学堂。在那里，他主修驾驶技术，系统学习了 5 年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学在内的多门自然科学知识，并接受了基本的实验技能训练。不容忽视的是，他所在的教学班用英语授课，兼授法语，^①使他得到良好的外语训练。毕业后他在扬武舰工作时受到有见识的英人舰长德勒塞（Tracey）的赏识。德氏归国前嘱咐严复：海军学业完成，不是学业的终点，“新知无尽”；“不第海军一业为然也”。严复听了这席话为之“悚然”。^②他的儿子后来记下的这一生动历史瞬间很可能在严复自己的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成为决定他后半生不凡经历的一分动力。所以，当后来有幸作为清廷派赴欧洲的第一批留学生到英国留学时，他放弃了可以和同乡学友刘步蟾、林永升、萨镇冰等一样成为后来甲午海战中担任北洋水师舰艇指挥或民国时期海军将领的机会，选择了去朴茨茅斯学校和皇家海军学院学习。其间，他观察国外的城市治理、去法庭旁听、与中国第一位派驻外国公使郭嵩焘一起讨论中西学术，并随同会见国外官员，使他亲身感受了西方政治法律制度的先进。尤其对西方法政、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了解，使他成为中国少数最先探入西方文化底蕴的人之一。

3

对严复所受传统教育的一面和他的传统文化修养，史华兹先

① 欧阳哲生：《严复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 页。

② 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载《严复集》第 5 册，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1546 页。